

书话岁月

顾均正的“和平梦”

■金涛

【我正是根据这些情节,认为《和平的梦》是可以改编成一部科幻大片的。】

面对美国科幻大片独领风骚的局面,据说中国影视界的有识之士也在筹划制作中国的科幻电影,这当然是令人兴奋的。不久前出席一个会议,我也听到业内人士说这项工作进展并不顺利,原因是国内从事科幻小说的作家太少,相应的可供拍成大片优秀作品也少,因而很棘手。这当然是意料之中的事。关于这个问题,我不想多说什么,只是由此想到,也许在以往出版的中国作家创作的科幻小说中,有些作品经历时间的淘洗,还有其巨大的价值——不论是故事情节的曲折,还是科幻构想的新颖,作为制作一部科幻大片,起码还是有借鉴价值的。

我在这里推荐的是顾均正先生(1902~1980)的《和平的梦》(湖南教育出版社,1999年8月出版,收入“中国科普佳作精选”)。

《和平的梦》创作于二战期间,发表于1940年,距今75年了。小说写的是美国与极东国(指日本)之间发生的信息战。小说的科幻构思是这样的:当美国与极东国发生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,突然美国本土朝野上下弥漫着反战的浪潮,人们纷纷上街游行,要求政府改弦更张,与极东国世代友好,并且荒谬地同意将一部分领土割让给极东国。

小说通过主人公、美国特工夏恩·马林的调查发

现,这是极东国向美国实施心理战的结果。极东国派遣的以科学家李谷尔为首的特工,潜入美国田纳西州荒无人烟的山岭,建立了一个秘密电台,每天晚上发射强大的催眠电波,使美国人入睡,然后向他们灌输与极东国友好的思想,于是,造成美国人心大乱。

小说最终是美国特工夏恩·马林冒着生命危险,驾机找到敌人的藏身之地,抓获了发明催眠法的李谷尔,以子之矛攻子之盾,威逼李谷尔照常发出催眠电波,但改变了灌输的内容,宣讲“极东国是美国的仇敌。美国决不能向极东国屈服。美国必须继续抗战”的道理,结果形势迅速逆转,美国全国上下一致要求与极东国血战到底,狡猾的极东国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。

《和平的梦》是典型的“硬科幻”。小说中,为了说明如何找到敌人的电台,插入了一段关于“环状天线”的科学依据,甚至画了几幅说明原理的技术性插图。有的评论者认为,这表明顾均正对科学小说的科学性十分注重。不过,“在小说中忽然插入一大段知识硬块,使作品失去了和谐的统一。”他们对此表示怀疑。

现在看来,《和平的梦》真正的科学构思并不仅仅是如何运用环形天线捕捉敌人的电台,除此之外,贯穿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线索,即极东国利用发射催眠电波,对美国人灌输反战的心理暗示,确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科学预测。考虑到小说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,当时信息战这个概念尚处在萌芽状态,但是《和平的梦》却以敏锐的洞察力,预见到以改变敌方思维的

电波,起到正面战场无法起到的作用,这是很超前的科学幻想,也是一个绝妙的科学构想。联想到今天无孔不入的信息战,以及形形色色的宣扬“颜色革命”的网络战,也许就不难看出顾均正先生的这部科幻小说的警世价值了。

我正是根据这些情节,认为《和平的梦》是可以改编成一部科幻大片的。它的场面很宏大,正面战场与隐蔽战线,美国国会与民间的互动,极东国的渗透和电子信息战,美国特工的追踪与搏斗……这些分镜头都是很有戏剧性的。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。

写到这里,忽然想到有一点是值得提的。从顾均正的《和平的梦》,到郑文光的《飞向人马座》、童恩正的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、叶永烈的《腐蚀》、王晓达的《波》等作品,可以看出中国的科幻作家沿着一个可贵的传统,即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意识。当祖国面临强敌威胁之日(不论是日寇侵华之日,还是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之时),他们都以自己的作品向世人显示了与敌人殊死抗争的爱国主义情怀,以及用科学发明的利器(科幻作家头脑中的发明,如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),与敌人一决雌雄的胆识,这是很可贵的。只是这些,似乎很少引起评论家的关注。

除了《和平的梦》,顾均正的科幻小说还有《伦敦奇变》(性变)和《在北极底下》,1940年由巴金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把《性变》外的另外三篇集结出版,书名《在北极底下》,后来以《和平的梦》为书名。

为了更生动地说明这一点,我曾在科幻小说《动若脱兔》中写过如下下的情节:

“这是东汉科学家张衡发明的地动仪,我国古代用来预报地震的。”一个小男生给一个小女生解释。

星河虽然走得匆忙,但还是回头拉住那名小学生。“小伙子,这不是预报用的。”

“那是干什么用的?”

“测量。”星河告诉他。“地震发生时它会有反应的。”

“事先不知道,事后才知道?那有什么用?”小学生狐疑地看着星河。“再说你是谁?”

星河赶在新闻发布会开始前五分钟走进会场,人差不多齐了。星河坐到袁文英身边,和她聊起刚才与小学生的席话。

“说明里应该强调了,他们可能没注意。”袁文英告诉星河。“我们有些历史成就确实被过分夸大了。”

“这可不是好事。”星河随口接口道。

“就是对它测量地震的本领我都怀疑。”

最后再补充说说有意思的羊绒问题。

羊毛出在羊身上,但羊绒只生在羊身上。由于山羊行动敏捷,喜登高,善跳跃,因此山羊采食范围广,可登崇山峻岭,悬崖峭壁。而且山羊嘴尖,唇薄齿利,能啃食树叶、嫩枝和幼嫩灌木,生命力极强。我国西北干旱、半干旱地区不宜发展其他畜牧,却适宜山羊放牧生长。加上羊绒价格快速飙升,因此这些地区过去曾大范围超载过牧,山羊不得不吃光一切植物,甚至掘草根,造成生态迅速恶化,荒漠化、沙尘暴加剧。因此一度引起声讨山羊罪行的热潮。“鄂尔多斯羊绒衫,温暖全世界”的广告词也反过来成了辛辣讽刺。于是,羊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替罪羊”。因为其超载过牧的过错原因在人而不在羊。当然,现在山羊主要已经改为舍饲,不仅照样“温暖全世界”,而且还提高了全地区的植被覆盖率。

羊与气象学

■林之光

也反会使羊绒变粗降质不值钱。这就是著名的羊绒“生态学法则”。

我国羊种分布也与气候有关。由于绵羊毛厚不耐夏热,因此主要分布在冬寒夏凉的北方地区,而山羊毛薄,因此夏季较热的南方也能分布。这就是气候与羊绒的关系。

羊喜干怕湿。气候潮湿时,特别是夏季高温下,和人类一样,羊通过蒸发散热的效率会大大降低。因此夏季高湿会使羊易于中暑。降水过多,夏季可以引起山洪,例如1975年8月5日~7日河南驻马店地区台风特大暴雨,引发中小水库垮坝,造成人畜大量死亡,其中包括羊在内的牲畜共40万头之多。降水过多,还会在潮湿草地上引起羊的腐蹄病和寄生虫病,等等。

但雨水过多造成的黑灾同样会造成羊群的大量死亡。例如2009年内蒙古部分地区50年不遇的旱灾,1/3草场甚至没有返青,牧区死亡牲畜共40万头之多。

但我国养羊业最大的气象灾害还是2008年1月中旬开始的席卷南方20多个省市区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,羊只大量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。风在3级以下一般对放牧是有利的。夏季高温时羊群还可适应4~5级风,但冬季中4级风就不行了。6~7级风一般都能引起羊群不安,甚至羊群因惊慌无法控制而“炸群”。风中夹沙,称为“黄毛风”,也是牧羊的灾害性天气,



图片来源:昵图网

阆苑有书

【因为地动仪本就不是用来“预报地震”的,而是用来“监测地震”的——也就说它发挥作用是在“震后”而非“震前”。】

尼泊尔地震时,我正在西藏讲学。不过受影响较大的地方似乎是拉萨以西的日喀则,而我当时正向拉萨以东的林芝进发——其时正在途中,也没有什么感觉。

有关的新闻,有关的消息,以及有关的道理,早已被人说尽,这里只想就一点小事再说说上几句。

因为这种灾难性地震的到来,网上再次掀起地震预报的讨论,类似的声音,在汶川地震后有,在玉树地震后有,今天不过是老调重弹。按理说很多专家都已反复说过,地震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动力学过程,就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而言,准确预报恐怕还比较困难。但网上总有一种声音,言及东汉张衡发明的“地动仪”,然后就是“古人都能预测现在怎么就不能”云云。

其实这个误区,究其缘由还是来自一些宣传上的误导。因为地动仪本就不是用来“预报地震”的,而是用来“监测地震”的——也就是说它发挥作用是在“震后”而非“震前”。至于说这个近2000年前的仪器是否真能监测地震,以及它的原型及复制品等诸多问题,此前已引发过一场大讨论,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但至少我们应该记住:地动仪是无法预报地震的。

为了更生动地说明这一点,我曾在科幻小说《动若脱兔》中写过如下下的情节:

“这是东汉科学家张衡发明的地动仪,我国古代用来预报地震的。”一个小男生给一个小女生解释。

星河虽然走得匆忙,但还是回头拉住那名小学生。“小伙子,这不是预报用的。”

“那是干什么用的?”

“测量。”星河告诉他。“地震发生时它会有反应的。”

“事先不知道,事后才知道?那有什么用?”小学生狐疑地看着星河。“再说你是谁?”

星河赶在新闻发布会开始前五分钟走进会场,人差不多齐了。星河坐到袁文英身边,和她聊起刚才与小学生的席话。

“说明里应该强调了,他们可能没注意。”袁文英告诉星河。“我们有些历史成就确实被过分夸大了。”

“这可不是好事。”星河随口接口道。

“就是对它测量地震的本领我都怀疑。”

山水人文

钱伟长的人文积淀

■吴胜明

【钱伟长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时,数理化三科成绩总和只有100分,但文科成绩出众。】

这一个月的时间,我十数次去国家图书馆阅读《钱伟长文选》,了解钱伟长的成才之路。其成才之路给人很大的教育和启发。

钱伟长28岁时留学加拿大,师从辛吉教授从事弹性力学研究,其博士论文就发表于世界导报之父·卡门60岁的祝寿文集中。31岁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,直接在冯·卡门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。钱伟长是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(即院士),他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。

钱伟长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时,数理化三科成绩总和只有100分,(其他同学大都在200分以上),但文科成绩出众。清华是进校后再选专业,清华中文系主任欣赏钱的作文,希望他学中文;历史系主任欣赏钱的史学修养,希望他学历史。当时日本入侵,民族危机,钱要走科学救国之路,决定弃文从理,学习物理。他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,谈了整整一个多星期才同意钱有条件地进入物理系。这些条件是:1.学年

袁文英补充道。“2000里外的地震,就算能感觉到震动,怎么可能正好让铜柱倒向那个方向呢?就算铜柱有‘感觉’,方向也应该是随机的才对。”

“不仅是靠地表传播的震动。地动仪中央有根棍子直通地下,在被埋设的部分上也有很多机关。地动仪的地下部分不比地上部分简单,所谓失传的就是这部分。”星河解释。“现在仿造的只有地上部分。”

“地上结构也太简单了,花销得像艺术品,地道的形式主义。”袁文英有些不屑。“还要专设一间房子供奉它,当神龛啊?我看那孩子说得没错,事后才知道有什么用?”

“还是有点用的。”星河貌似严肃起来。“考虑到当时没有电视、电话和网络这些先进的通讯方式,这玩意能把几千里外出现震情的事态即时报于中央领导知道。等外地信差累死一打快马,几个八百里加急下来,气喘嘘嘘地报告皇帝陛下:某某地方发生大地震了!这时圣上可以很潇洒地微微一笑:朕早就知道了。”

这篇科幻小说最初的创作动机,源自幼时在父亲的科普刊物里读过的一篇文章,里面提到了利用人工爆破疏导地震的方法;开始写作后,一直想要创作这一题材。在我印象中文章来源是《科学文摘》,但后来在国家图书馆把该刊从创刊到停刊各册都找了出来,仍未找到那篇文章,最后只凭着记忆里的一句话构思了作品。创作前阅读了大量有关地震的图书,在网上查找了大量资料,还特意去听了一学期的数学建模课。这篇作品发表于《科幻大王》2008年第1期,我还专门在文前写下了一句题记:“即使你能准确地预测每一次地震,也不能挽救所有的生命。”没想到的是,作品刊发后仅4个月,就发生了汶川特大地震。令人遗憾的是,其时人类并未尚未掌握控制地震的方法,甚至连准确预报地震都没能做到,而且人类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继续遭受着这种自然灾害的伤痛。不过我相信,终有一天,人类会有能力做到有效地控制和预防地震灾害。

结束时,物理和微积分的成绩都超过70分;2.选修化学;3.加强体育锻炼,因为钱入学时身材瘦小。物理不是那么好学的,一连7个星期钱不及格。但他不灰心。最后学年结束时各科都达到80多分。

是什么原因使钱伟长能念好物理,并且在清华当年21位学生中脱颖而出,在科研中取得杰出成就,除了众人所说的勤奋、天分等等之外,笔者认为其深厚的人文科学积淀是造就钱的重要条件。钱伟长的叔叔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,其高中时代就是在叔叔当校长的学校度过,是叔叔把他培育大。1990年11月4日《文汇报》,钱伟长写了一篇《谈四叔钱穆》,内中写到:

“在苏州中学读书时,听四叔讲文学,从《诗经》《史记》《六朝文赋》讲到唐宋诗词;从《元曲》讲到桐城学派、晚清小说,脉络清楚,人物故事有情有节,有兴趣,有比喻,妙语连珠,扣人心弦。我和他朝夕相处,耳濡目染,学到不少东西。”

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,他们结婚时的证婚人是朱自清和吴有训。钱的夫人给钱以影响是不需说的。

这里不能不提到钱伟长作为自然科学家,还是汉字简化委员会的委员,下面引用他的一段话:

“我举一个例子,汉字的‘汉’,我也不晓得是怎么简化出来的。这右边的‘又’代表好几个字,如‘漢’改成‘汉’;还有一个字‘歡’改成‘欢’;还有‘樹’中间部分也改成‘义’。笔画多的都简化成‘义’,这怎么可以呢?应该系统地简化,这几个字还应该是不同的,应该用不同的符号代表这几个字。”

这就是科学家。一个符号只应该代表一种意义,这是物理学乃至所有科学中的惯例。不然“科学大乱”。

钱老的人文修养之高是罕见。他熟悉《诗经》,唐诗词,对山水应该是钟爱的。钱老是一个正直的科学家,1957年反右时,被错划为“著名右派”。所以从1957年到1977年20年“无工作”,周恩来总理惜才,在“文革”后期指定凡是到清华大学采访、参观的外国人一律由钱伟长作英文翻译,给钱一份工作。

电影导演伊文思的访问也是由钱担任翻译的。一位老科学家告诉我,中国人学英语分三个层次,最低的层次是和外国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顺利交流;中间的层次是在你的专业范围内,能够和外国人熟练交流;最高的层次是你能够看懂(注意是懂)外国小说、外国电影并能和他们交流。钱能够和外国电影导演交谈翻译,可见他的人文积淀。不然,他胜任不了这种翻译。

尼泊尔地震引发的回顾

■星河

观天平有感

■苏青

公平不公平,称秤要小心。良心若有病,称杆永不平。

公平不公平,老天自有心。人心是杆秤,好坏分得清。

公平不公平,公道各有理。世间不平事,依法来搞定。

公平不公平,特等大事情。人类发展史,两字判输赢。

破解奥斯汀小说中的人名地名

■武夷山

【Catherine Morland的名字则是双关语:她家需要更多的土地(Moreland)。Morland的发音与“更多的土地”是一样的。】

众所周知,《红楼梦》中的人名都有玄机。无独有偶,英国著名作家简·奥斯汀的小说中,名字也不是随便起的。2015年3月,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加拿大作家Margaret Doody的一本书,题为Jane Austen's Names: Riddles, Persons, Places(简·奥斯汀小说中的名称:谜语、人名、地名)。Margaret Doody生于1939年,擅长创作历史小说和开展女性文学批评。她也是美国圣母大学的文学教授,该校的文学博士培养计划就是她帮助创立的。

Margaret Doody说:“如果我们不喜欢谜语,就无法理解简·奥斯汀。”奥斯汀家里有一本谜语书,是全家喜欢的读物。她给作品中的某些名字赋予特定的含义,就好比出了一条条谜语,懂得猜谜规则的才可能破解。Margaret Doody则正是一位善于猜谜的作家。奥斯汀家的人特别喜欢拿某些名字开玩笑,

“理查德”便是其中之一。例如,奥斯汀曾在给妹妹卡桑德拉(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唯一被认可的奥斯汀的画像就是卡桑德拉画的)的信中开玩笑说,“理查德·哈维的婚事被推迟了,除非他重起一个较好的名字”。在奥斯汀的小说Northanger Abbey(诺桑觉寺)中,Catherine Morland的父亲就叫理查德。理查德这个名字哪儿不好呢?在英语中,理查德的昵称是狄克(Dick),而在奥斯汀那个时代,Dick这个词与“女人气”和“失败”相联系。在奥斯汀的小说《劝说》中,Dick Musgrove就具有这样的特征。

Margaret Doody还说,如果我们不了解英国的历史,也难以理解奥斯汀。她的小说深深植根于历史重大事件中,她对都铎王朝和英国内战的态度,都可从小说人物中一窥端倪。比如,Fitzwilliam Darcy(费兹威廉·达西)是《傲慢与偏见》的男主角。若将其名字拆开来看,分别看看Fitzwilliam和Darcy,能发现些什么?英国历史上有位William Fitzwilliam,他曾经是全英国最有钱的人,而另一位名叫Thomas Lord Darcy的则因其在求巡巡礼骚乱(Pilgrimage of Grace)中的角色而掉了脑袋。在奥斯汀心目中,Fitzwilliam是自私自利的象征,而Darcy

是托利党的英雄。因此,她将最性感的主人公起名为Fitzwilliam Darcy,意在表明此人是恶行与美德的混合体。

Catherine Morland的名字则是双关语:她家需要更多的土地(Moreland)。Morland的发音与“更多的土地”是一样的。在奥斯汀的小说《理智与情感》中有一位Dashwood,这个名字与Francis Dashwood爵士联系到一起,这位贵族是奥斯汀家的远亲,是该俱乐部的成员都是很有身份的上等人士,但他们会聚在一起从事很不雅的勾当。于是,书中的Dashwood这个名字与神秘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
人名是有寓意的,地名也不是随便便起的。例如,《傲慢与偏见》中本内特夫妇的宅子地处Longbourn,其含义是long boundary(长长的边界),因为这块地曾挨着一条河。

如果没有注解,中国作者未必能看懂《红楼梦》人物甄士隐的意思是“真事隐”。同理,没有Margaret Doody的挖掘,我们中国读者更难可以看出,奥斯汀的小说除了深刻揭示人性之外,连人名、地名都蕴含了那么多有趣的东西。